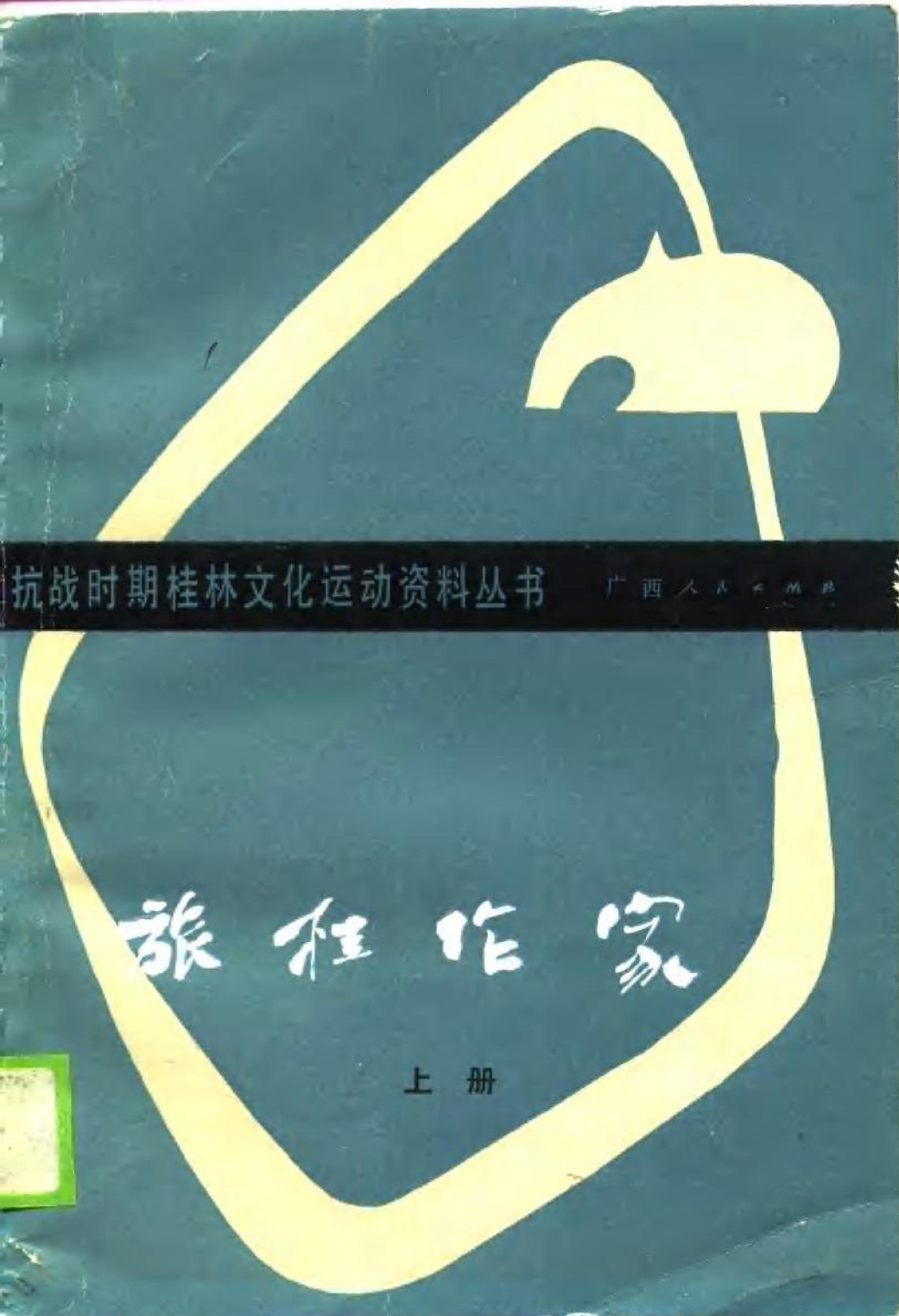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张狂作家

上册

•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

旅 桂 作 家

上 册

广西师范大学 主编

编 写 者

苏关鑫 雷 锐

黄绍清 肖昭惠

广西人民出版社

877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旅桂作家（上·下册）

广西师范大学 主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31印张 插页4 74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ISBN 7—219—01430—9 / I · 415

定价：12.65元（全二册）

•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

旅 桂 作 家

下 册

广西师范大学 主编

编 写 者

苏关鑫 雷 锐

黄绍清 肖昭惠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司马文森在桂林



邵荃麟在桂林



田汉在桂林

1939年黄药眠在桂林
黄药眠（右：穿长衫）





西南剧展期间十人评议团合影
(田汉 韩北屏 孟超 陈迹 冬 秦似 周钢鸣 秦牧 华嘉 骆宾基 洪道)



在桂林出版的几个剧本



欧阳予倩一家在桂林

桂林文化城将因他们而增添光彩

(代序)

苏关鑫

桂林素以“山水甲天下”名满天下，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又以西南“文化城”享誉全国。风景名城又加上文化名城，确使桂林增色不少。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桂林地处广西东北部，交通方便，是中原、华东联结西南、华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向香港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政治中心。由于历史的原因，桂系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在全国抗战、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定形势下，桂系为发展自己的力量，以摆脱蒋介石集团的控制，在政治上对我党限制较松，采取了招贤纳士等较开明的措施。我党为了争取桂系的支持，利用蒋桂间的矛盾，以便把桂林建成支援前线抗日的后方基地，对桂系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桂林文化城就是在这样的地理和历史的社會背景下逐渐形成了。

桂林文化城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第二阶段：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4年下半年湘桂大撤退。

1938年10月中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原先从平津、上海等地集中在上述两市的文化工作者分别往重庆、桂林撤退。1938年11月初，我党在桂林设立了以李克农为主任的八路军驻桂办事处。这是党在桂林建立的公开合法的领导机关。12月初，郭沫若率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从衡阳抵达桂林。12月中，桂系智囊团广西建设研究会所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创办。1939年1月，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从广州迁至桂林复刊。这些重大事件及活动集中了大量文化人，并不断地吸引文化人向桂林集结，桂林文化城于是形成。这是第一阶段。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广西当局亦步亦趋，也开始对进步力量进行压制和迫害。八路军驻桂办事处被迫撤离，《救亡日报》也因拒登国民党中央社所发的歪曲事变真相、诬蔑新四军的电讯而遭封闭。部分文化人在党的安排下撤往香港，而留下来继续战斗的同志则处境艰难。1941年是桂林文化城处于低潮时期的一年。其主要原因，正如邵荃麟所指出的：“政治朝低潮走，文艺运动自然也免不了受影响”。这是第二阶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日寇占领香港。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在东江纵队的掩护下，历经艰险陆续抵达桂林。其中除部分系重返桂林的以外，不少是皖南事变后由重庆撤往香港又转至桂林的，故人数之多甚至还超过第一阶段。从总体看，这阶段开始不如第一阶段活跃，但确是步步走向高潮的，其顶点是1944年2月15日到5月19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举办。6月，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国民党广西当局接连发布三次强迫疏散令，至9月14日最后一批文艺工作者撤离桂林，11月12日桂林沦陷，文化城宣告结束。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物质产品主要由工人、农民所创造，精神产品则是各类知识分子的心血所凝成。文化城的形成离不开文化人的劳绩。作为文化城的特点是文化人的高度密集。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生活、战斗过的作家、艺术家、出版家、记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下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是构成文化城的主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心血浇灌，文化团体，宛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书店出版社，鳞次栉比，门庭若市；报纸刊物，百花争艳，琳琅满目；戏剧及文化活动，推波助澜，高潮迭起。他们的劳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戏剧史、出版史、新闻史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作家是文化人中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绩为桂林文化城增添了光辉；而桂林文化城又为他们提供了比其他国统区优越的跃马扬鞭的驰骋天地。这是一种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

欧阳予倩可说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是在桂林生活、战斗时间最长的作家之一。他与桂林关系最深。早在1910年他祖父欧阳中鹄任桂林知府时到过桂林。1938年5月间，他应留日同学、原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邀二到桂林，8月下旬离桂赴港。1939年9月28日，他应白鹏飞之邀三到桂林，直到1944年9月撤往昭平。抗战胜利后，他于1945年10月20日又回到桂林，至1946年9月上旬，才离桂赴沪。抗战以来，他在桂林生活了7年时间。凭着他精深的艺术修养和在文艺界的崇高声望，加上他的广西艺术馆馆长的合法地位，这7年，是他施展才华、实现其宿愿的7年。早年，他“下海”当过15年职业京剧演员，深知旧剧的痼疾，三十年代初他游历欧洲，回国后大力提倡京剧改革，但因战事爆发未能如愿以偿。到桂以后，他把旧剧改革的理论运用到对桂剧的改革上，先后把《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人面

桃花》等改编成桂剧，并创编了《搜庙反正》、《广西娘子军》等新桂剧剧本，使桂剧在表现现代生活上作了成功的尝试。皖南事变后，他是全国率先以历史剧为武器，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剧作家之一。他所创作的《忠王李秀成》，着力描写了李秀成为了天国的事业忠贞坚定、舍生忘死的崇高品质，痛斥天王的昏庸猜忌、皇亲国戚争权夺利，李秀成纵有雄才大略，无从施展，天京终于陷落。剧本揭示出内部分裂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因，说明了大敌当前团结对敌的重要。在分裂倒退的阴影笼罩国统区的时候，这样的主旨其现实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剧本不仅在欧阳予倩的创作中，即使是在抗战戏剧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欧阳予倩还是文协桂林分会的历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参与分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文协桂林分会是全国各分会中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分会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田汉、瞿白音等共同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作为主任委员，他殚精竭虑，倾注了全副的精力，使西南剧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总之，桂林文化城的每一个重大的文艺活动都留下了欧阳予倩的印记，桂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欧阳老的光辉业绩。

艾芜在桂林生活和战斗的时间也不短。从1939年初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整整有5年多时间在桂林度过。这5年，是他的创作热情象火山般喷发的阶段。光是长篇小说，就写有《山野》（1941）、《故乡》（1942）、《落花时节》（1943，与《春天》一起合集为《丰饶的原野》）等三部，短篇小说集更多，计有《逃荒》（1939，收4篇）、《萌芽》（1939，收5篇）、《荒地》（1942，收13篇）、《秋收》（1942，收8篇）、《黄昏》（1942，收12篇）、《冬夜》（1943，收14篇）、《爱》（1943，收20篇，系《黄昏》的增订本）等7本，连同稍后结集在《我的旅伴》、《童年的故事》中的若干单篇，他在桂林创作的短篇小

说，合计约有七、八十篇之众。艾芜在三十年代初以《南行记》在文坛崭露头角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之火，更使他创作锐气益发高涨。他说，对文艺，我“早就认清这不是致富之道”，但仍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因为他要用自己的笔为抗战出力，“写出对同胞的爱，也写出了对敌人的最大仇恨”。在桂林的5年里，他创作极为勤奋，只看过两场电影和一次戏。他生活极为艰苦，长期住在桂林东郊观音山的一间简易竹楼里，自己种菜养猪，形同难民。有一次半夜，警察竟以抓小偷为名，破门而入，实际上是把当作无业游民看待。提这些，无非想说明艾芜上述大量创作的来之不易。面对这些材料，想必读者自然会对艾芜表示深深的敬意。

其实，生活的不安定远不止艾芜一人，而是旅桂作家的共同遭际。名满全国的著名作家茅盾在1942年3月自香港脱险抵桂，一时觅房困难。在旅馆滞留半月，幸亏邵荃麟、葛琴夫妇危难相助，腾出作厨房的一间小屋，才使茅盾夫妇得以栖身。“一榻之外，仅容一方桌”，“方桌上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房小，环境也嘈杂。楼上经常有人打牌，“牌声不断”，楼下三四女佣洗衣弄菜时交换各家新闻，“杂以诟谇”。就在这奇小的住房又堆满瓶罐的方桌上，在“两部鼓吹”的噪音中，9个月里，茅盾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和《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列那和吉地》等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评论。《霜叶红似二月花》一问世，就引起文艺界的广泛注意。1943年10月桂林《自学》杂志和《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巴金、田汉等在会上一致肯定作品的巨大成就，并联名发电报给已去重庆的茅盾表示慰问和祝贺。抗战以来，田汉曾先后三次来到桂林，而以皖南事变后的第三次为时最长（从1941年8月23日到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

在桂期间，他居住在花桥附近施家园的一间小楼里，没有固定的职业，一家8口人全靠他的稿费维持生活。当时物价暴涨，时有捉襟见肘之概。《大公报》记者在记述田汉生活时这么写道：“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8口人的生活负担。……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费是30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有时还揭不开锅，熬米度日。生活的清苦使这位剧坛名将两鬓斑白，然而他乐观坚定、斗志高昂，创作热情不减当年。在桂期间，他创作了《秋声赋》、《再会吧香港》（与夏衍、洪深合作，又名《风雨归舟》）、《黄金时代》等话剧和《新会缘桥》、《双忠记》、《金钵记》（后改名《白蛇传》）等戏曲本，还写了大量戏剧论文。田汉素以才华横溢、才思敏捷闻名剧坛。1941年10月5日新中国剧社成立，为了表示对剧社的支持，除破例与杜宣共同担任《大地回春》的导演外，日夜赶写《秋声赋》。当时广告已经贴出，合同已经签订，为了及时排练，按时公演，田汉竟然拿起铁笔直接在腊纸上写剧本，在剧坛一时传为佳话。剧本脱稿后，他赋诗一首：“银牙咬碎血尤鲜，错节盘根见杜宣；待得风雨鸡鸣日，唱出秋声赋一篇”。他是桂林戏剧乃至文艺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每一项重要的活动都闪现他高大的身影，尤其是他与欧阳予倩等共同主持的规模空前的西南剧展的举办，更表现了他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同行们都尊之为田先生，或把他昵称为“田老大”，只要他在场，准保气氛活跃，满屋生辉。

值得特别一书的还有在艰苦岁月中挣扎并取得斐然成果的《野草》诸君子。《野草》创刊于1940年8月20日，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以发表杂文为主的文艺月刊。《野草》作名，始见鲁迅，但“并非全然因袭”，其办刊宗旨是“希望给受伤的战斗者以一个歇息的处所，让他们退到野草里，拭干伤口的血痕”，以便“恢复一些元气，再作战斗”，“至于原本就很健康的人们，自然也

可以到这野草上呼吸一些苍葱气息”(见创刊号《代发行语》)。在《编后语》中更进一步申述编者的意图：“想在杂文的厄运下打破沉寂的局面，垦辟一片荒芜的战场，让更健全的战士们进军”。上述宗旨和意图在刊物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野草》编辑者为宋云彬、孟超、夏衍、秦似、聂绀弩(按姓氏笔划为序)。五人中，秦似年龄最小，只有20来岁。他是1940年初在给《救亡日报》投稿时被夏衍赏识而从桂南邕来桂林的。桂林，就成了秦似正式踏上文坛的出发地；而《野草》则又是他的起跑线。在几年中，他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善于旁征博引，以酣畅淋漓、辛辣幽默的笔调，抨击时弊，形成他杂文的独特风格，成为当时颇为注目的杂文家。1928年“太阳社”成员孟超，是五人中资历较深，成熟老到的作者。他长于借历史和传说来讽刺抨击反动统治者的劣迹，文笔泼辣恣肆。他的文章使人读后既长知识，又感到痛快。聂绀弩在战前就因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受到鲁迅的赞扬，1940年4月来桂后也以杂文为主要武器抨击黑暗现实。他的杂文笔墨隽永，援古证今，寓意深长。夏衍是《野草》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但皖南事变后，离桂赴港，太平洋战争后二次来桂，不久去了重庆，故在桂期间杂文写作不多。但一经为之，则笔调明快，议论深刻，切中时弊。宋云彬则长于从学术性的问题着手，针砭现实。这五位成员各怀绝招，集合在一起，再加上得到郭沫若、茅盾、邵荃麟、何家槐等名家之助，《野草》办得风风火火，演出了一幕幕壮剧，为文化城增添了不少生气。当时远在昆明的《战国策》派公然为法西斯张目，鼓吹“弱肉强食”的禽兽之道，大唱“妇女应该回厨房”的老调子。《野草》给予了狠狠的回击，使教授们穷于应付，《战国策》这个官办刊物也原形毕露，终于偃旗息鼓。这是《野草》进行的两次集中的战役，打得漂亮、过瘾。至于零星的游击战，则机动灵活，随时进行。

《野草》发表大量脍炙人口的妙文，如聂绀弩的《韩康的药店》、孟超的《诗人节从屈原谈起》、秦似的《人语与鬼话》等，一经发表，即不胫而走，传诵一时。《野草》创刊刚满一卷，就碰上皖南事变。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野草》依然挺立在政治低气压的环境中，或虚与周旋，或迂回出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重视。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日理万机，还嘱人每期寄给他两份。《野草》出刊3年，共5卷29期，另外出有“野草丛书”两套共16册。在杂文自鲁迅去世后一度沉寂的情况下，尤其是张道藩下令不准讽刺、不准写黑暗，致使杂文更加凋零不振的情况下，这些书刊无疑为桂林文化城、为抗战文学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桂林文化城的繁荣是旅桂作家共同努力所创造。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战斗岗位，运用自己惯用的武器进行着各自的战斗，要说的自然远不止上面这一些。好在本书已逐人收集整理，请读者随手翻阅，以窥全貌。

下面谈谈有关编写中的一些问题。

1、本书书名为《旅桂作家》，这就自然圈定了范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桂”，首先指的是桂林；但同时也指广西。作家，按狭义理解，指的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包括从事音乐、美术的创作人员或各类表演艺术家、记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合起来说，旅桂作家是抗战期间旅居桂林（或广西）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的总称。

2、入选的作家必须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或则在抗战前已经从事创作并产生过相当影响，在桂期间继续有所成就的；或则是在文化城期间新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战后又继续从事创作并取得成就的。限于篇幅，虽在桂期间从事创作，但影响不大，此后又从事与文学关系不大的工作的人，暂不入选。入选作家按姓氏笔

划为序排列先后。

3、入选的作家均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作家在桂活动简况，内含作家来桂、离桂的原因和时间，旅桂期间的创作及社会活动年表，原则上是越具体越好。其二是作家在桂创作内容简介，凡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摘录其故事梗概；理论文章顺其思路录出其要点。原则上是客观的介绍，不用评论式的语言。文字的多寡的依据大体上是：重要作家的作品文字多些，次要作家的作品次之，重要作家的次要作品又次之，次要作家的次要作品居末，有时仅存其目。

4、入选的作品或文章是指作家本人在桂林创作并发表在桂林报刊的；本人虽在桂林写出但发表在桂林以外地区（如重庆、香港等）报刊的作品只作少量或不作收录；至于本人并未旅桂或虽旅桂但又离桂后，则即使发表在桂林报刊者，一律不录。

5、本书乃四人合作的产物，具体分工是：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熊佛西、孟超、聂绀弩、廖沫沙、何家槐、周立波、葛琴10人由苏关鑫负责编写；郭沫若、柳亚子、巴金、叶圣陶、艾芜、骆宾基、端木蕻良、王西彦、林焕平、穆木天、彭慧11人由雷锐负责编写；黄药眠、胡风、宋云彬、周钢鸣、秦似、韩北屏、芦荻、彭燕郊8人由黄绍清负责编写；茅盾、夏衍、艾青、王鲁彦、司马文森5人由肖昭惠负责编写。

在全书编写过程中，苏关鑫作为召集人，协调工作；在全书脱稿后，由他作简要的文字润色。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全书编写有总的要求，但由于执笔人情况不一，故对原作的理解或有不同，概括的准确性亦有差异。另外，由于桂林文化城期间的报刊散失严重，本书远不能说是包括了某作家的所有著作，遗珠之处，定然不少，只能待日后弥补了。

在收集材料过程中，曾蒙云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